

火 花

第 三 卷 第 一 期

中 國 共 產 主 義 同 盟 理 論 機 關 報

目 次

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

編 者

論第三國際的第七次大會

托 洛 斯 基

史大林的有機過程

托 洛 斯 基

誰保護蘇聯，誰幫助希特勒？

托 洛 斯 基

蘇聯之現狀

托 洛 斯 基

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

孔 甲

一 九 三 六 年 三 月 十 日 出 版

募捐啓事

火花是中國無產階級惟一宣傳國際主義的刊物，是中國革命馬克斯主義者惟一號召階級鬥爭的喉舌。正因爲此，牠得不到一切外來的資助。這一小小的刊物，是用我們少數人由血汗掙得的金錢來維持的，牠時常陷於極度的困境，以致常不能與讀者及時相見。一切愛護本刊的工友，以及其他的朋友們！火花極需要你們金錢的援助，無論捐助多少，都是迎歡的！

火花編輯部啓

在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

編者

現在我們又遇到了一個新的歷史任務。這任務就是要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重新準備一個領導其走向勝利的第四國際！

對於這個任務，一切第三國際的盲目崇拜者以及各式各樣的懷疑主義者們，必然會表示忿怒或驚奇的吧。但是，我們知道人類的前進，並不是依照着直線，而且循着一條艱難複雜的道路，牠不能以羅盤儀來測量，而須由各方面活的力量來決定的。工人階級的歷史也不是例外。這一個現代人類中唯一進步的階級，在牠每一次取得勝利之後，總要多少許多新失敗的代價。第一國際奠定了牠那解放的理論基石，但因羣衆基礎之缺如而消散；第二國際團結了廣大的工人羣衆，盡了許多教育的工作，並且在政治與文化上，提高了不少工人階級的地位，但結果又陷於民族主義與改良主義的迷途，因而喪失其歷史的生命；在大戰與十月革命的烈燄中，產生了第三國際，牠把革命的馬克斯主義從社會愛國主義的陷坑中救拔出來，真正地進行了國際革命的政策；但同時因革命本身的矛盾發展，牠又產生了蘇聯內部的官僚階層，這階層在史大林的愚蠢與粗魯的領導之下，復受世界工人運動失敗的影響，日益走向民族社會主義的道路，耗費了十月革命所積聚下來的政治資本。迨一九三三年在希特勒之前投降以後，第三國際的政治生命算已宣告了死刑。

因第二第三兩國際之澈底叛變，世界無產階級陷於無出路與無希望的狀態。一部分在法

西斯的野蠻統治之下吞聲飲恨，另一部分雖然具有鬥爭的情緒，然因找不到正確的領導，反而墮入改良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陣營中去！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帝國主義的強盜們，在鎮壓了本國的無產階級之後，以全力來準備新的大戰了。在這一場戰爭危機或實際的大戰中，假使無產階級得不到正確的革命領導，以奪取政權而終止戰爭，則人類將遭受最大的禍害，而歷史將倒退到野蠻狀態中去。

因此，目前人類歷史的唯一任務，就是要創造一個領導世界無產階級走上勝利的國際組織。因為無產階級乃是目前人類唯一的解救者，牠的勝利，也就是人類解放之道；至於這個國際的組織那就是替代腐敗的第二第三兩國際而起的第四國際！

這正是人類歷史之辯證的發展，也就是階級鬥爭必然的結果，我們不應感傷，更無須驚奇，我們該認清楚這一個前進的路向，勇敢地擔負起這個艱巨的任務。

在一九三三年的八月，即緊接着第二第三兩國際在德國悲慘地暴露其背叛之後，國際上有四個工人組織：左翼反對派（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國際局；德國社會主義工黨；荷蘭社會主義工黨；荷蘭獨立社會黨；集會於巴黎；他們宣佈了第三國際的死亡，並確定了十一條原則，作為新國際成立的基礎。這是第四國際的濫觴。

那四團體的宣言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一條，但牠却是過去三個國際之寶貴經驗的總和，是引導我們去尋找革命出路的唯一路標。

牠首先與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決裂，肯定了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鬥爭，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繼而與第三國際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清算，堅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

革命的國際性與不斷性。接着就把另一極端的奧國機會主義理論加以駁斥，這理論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之國際性為藉口，在其本國宣傳消極與等待』，宣言上明確地規定了『單獨一國的無產階級能首先爆發革命，並應由社會主義的建設來鞏固牠一國內的專政』。然後又根據着最近幾年的史實，尤其是德國失敗的教訓，宣佈第二國際的僵化與第三國際的死亡，同時又承認蘇聯之仍為工人國家，肯定了保護蘇聯的任務，繼又確定了黨內與國家機關內民主的需要，與史大林的絕對官僚主義絕緣。就這樣，樹立了第四國際的初步基礎。

兩年來的歷史，只是充分地證明了那宣言的正確與需要。第二國際雖因共產國際之叛變而一時呈現了活躍之象，但牠的全部政策却始終還是靠着資產階級走狗的作用，牠的領袖——樊迪文，做了他國王之忠順的大臣，至於在反戰，對國際聯盟，以及對『制裁』的態度，第二國際的各黨，無不跟在資產階級的後面，散佈着愛國主義的欺騙，因此，一些左派的分子和組織，都紛紛與牠脫離，別找新的革命出路；至於第三國際則因『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理論的澈底發展，根本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立場，他們把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常作蘇聯與各帝國主義間實行外交拉攏時之抵押品，所以，第三國際已簡單地降為史大林外交的輔助機關，牠擁護國聯，擁護帝國主義的『均勢』，更公開地擁護法帝國主義的國防政策，牠將各國無產階級騙入於愛國主義的成見，即澈底改變了共產主義的基本政策；第三國際墮落到這個地步，牠的政治生命也就無可拯救了！

因此，在一九三五年之春，簽名於『十一條宣言』的四團體中，除德國社會主義工黨，因上層領袖之中派傾向而表示退出外，其他三團體又聯絡了美國的合衆國工人黨與加拿大工黨

，聯名發表了一個『爲建立第四國際的公開信』，牠詳細分析了兩年來世界工人運動的狀況，以及第二第三國際領導之愈益破產，因而把建立第四國際的需要及其意義，更加闡明得詳盡了。如今在這新的旗幟之下，已經團聚了許多國家的革命組織，并且還有許多在半途徘徊的組織，——如英國的獨立工黨——也正在趨向於牠。

在中國，第三國際所屬的中國共產黨，也已經喪失其存在的生命。

因爲中國革命潛存勢力之雄厚，以及中國無產階級英勇的奮鬥，使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大革命中，發揮了偉大的力量。但當其存在之初，就被史太林派機會主義所腐蝕。故雖處於極順利的革命環境中，終於還是悲慘地失敗了下來。

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國革命之慘敗，同時也表示了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的潰散與政治上的破產。恩格斯說：『一個錯失了革命局勢的政黨，必將有一個較長時期退出舞台』。這真是一個不容否認的痛苦經驗！在大鬥爭中打敗下來的政黨，只當牠在嚴格的批評精神中，將自己的經驗加以深刻的研究，並從而得出一切應得的經驗，使自己的思想重新武裝，才能重新站起腳來，才能準備第二次走上舞台。

但是史太林派的官僚却並沒有這樣做，牠簡單地宣佈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爲『帝國主義的力量太大』（見六大決議）（這就是宣佈中國革命在帝國主義未倒之前爲不可能），並爲要保持其『總路線』之『絕對正確』起見，竟無恥的以橫暴的官僚手段加之於中共的領導者之身，將昨日被譽爲『偉大領袖』的人們，加以『機會主義者』的罪名而用作史太林錯誤領導的替罪之羊，更可恥的；他們自己既不能且不願求得革命失敗的教訓，他們又反對別人去從事此種工

作，他們把中國工農用頭顱換來的寶貴教訓認爲『取消主義』，更宣佈那些接受這分教訓的人們爲『反革命』，他們用無恥的逼害方法來對付中國的馬克斯主義者！以致政黨墮落成簡單的官僚機關，政治思想則局限於史大林錯誤決議的背誦。六七年來，他們由機會主義轉入於盲動主義，復由盲動主義進入單獨依靠農民的『紅軍蘇維埃』運動，更由這運動走入於最近的所謂『新政策』，即進行階級合作與完全放棄共產黨獨立立場的新政策。

至於中國反對派則完全是站在上次大革命教訓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同時牠又接受了國際左派反對派的主張，成爲國際布爾塞維克列寧派之一員。牠始終站在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從事於鞭策與批評的工作，同時提出牠自己獨立的主張，即及時提出民主鬥爭的口號，以便在反革命時期團聚和動員羣衆，使工人階級重入政治鬥爭，使土地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有適當的配合，藉以重起革命，奪取政權。（關於各種問題的基本意見，已詳見於我們的十要文件中，此地不再詳述）

但是中國共產黨非但不曾因我們的批評與鞭策而得到挽救，而且因整個國際的破產而完全喪失其生命；因此，中國左派反對派也放棄其從來在第三國際內部改良的工作，而從事於新黨建立的準備工作了。

中國共產黨目前所號召的『新政策』，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戰略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牠的基本政策是『一致團結共同對外』，即否認了階級鬥爭的主要立場；牠的主要任務在『中華民族奮起拯救祖國』，即完全墮落於國家主義的泥坑中去。他們的唯一政策，就是想與蔣介石、陳銘樞、馮玉祥等人勾結，企圖『保護蘇聯』，其實牠只能將中國工農的力量摧

毀無餘，也就是加速帝國主義對蘇聯的進攻。

因此，宣佈中國共產（？）黨爲中國工農大衆的叛徒，並進而爲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國際之建立而鬥爭，已成爲每個覺悟工人與每一真正共產主義者的迫切任務了！

目前中國正處於最嚴重的時機，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愈來愈甚，而國民黨蔣介石的恐怖統治，也愈不可忍受。這時中國無產階級的，也就是全民族大衆反日與反國民黨的解放鬥爭，實已成爲最迫切的歷史任務。然而要希望這一鬥爭能得到勝利，則首先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的破產領導，只能使這一鬥爭走上毀滅的道路。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與土地革命如欲得到勝利，必須在無產階級的堅決領導之下，因而必須有一個實行革命的階級政策之工人黨，正確地領導這一運動，使其奪取政權，才有可能。倘如史大林官僚支配下的中國共產黨那樣，企圖與國民黨資產階級聯盟，建立『國防政府』，以解決這些任務，那不僅是痴人說夢，而且還是反革命者有意的陰謀！

一切覺悟的工人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趕快離開這個叛變的中國共產黨，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之下來，爲建立中國的新黨而鬥爭！

不過在中國，我們相信也會像在別處一樣，一定會有許多懷疑的中間主義者，他們雖然承認兩個舊國際的死亡，但又不願參加第四國際的準備。在這些人中間，有一部分是只會崇拜既成權威而毫無創造精神的怯懦者；另一部分人則因對舊國際之失望而走上民族獨立黨的道路。對於前者，我們不願多費唇舌；對於後者，那我們希望他們能認識國際領導組織的形勢，乃是舊國革命運動勝利的先決條件。失去了國際聯繫的民族黨，只能走入墮落與死亡之

途。

因此我們——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願盡一切的力量來爲第四國際的建立開闢道路；不過我們決不妄想單靠我們一派的力量來成此偉舉，我們希望一切能接受『十一條』原則的個人與組織，都來和我們共同進行。首先自然要在政治的思想取得一個共同的步調。因爲在實際的範圍中，雖然已經有了『四圍體宣言』與『公開信』之原則上的基礎，但這還不過是一個基礎罷了，站在這個基礎上，還須我們作長期的與艱苦的鬥爭！我們工作是困難的，但這是唯一可以推動歷史前進的工作。

我們這個機關報，希望能成爲這一運動中的一個有力工具；一切願意爲這新國際鬥爭的人們與組織，可以在這裏貢獻他們的意見。我們希望這個小小的刊物，能成爲中國新黨的初步組織者！

論共產國際的第七次大會

托洛斯基

1. 史大林派的轉變

關於第七次大會的批評，雖然有許多人提醒過我，可是一直到現在才來着手，這對於我們這本國際刊物的讀者，要表示歉忱的。遲延至今的原因，倒並不在於我的緣故，一方面，大會上的辯論是極其糝糊不定而且是有意混淆，另一方面則此種辯論完全具有戲劇的性質。各種問題的討論與決定，全在幕後進行，常時在克林姆宮與外交人民委員會間的電話中進行了。在那狹隘的官僚層中，似乎發生過一次意見上的衝突。不過等到政治局中最後決定以後，發指定的演說者，一定要用這樣的態度去報告的，彷彿共產國際的上層對牠（政治局的決定——譯者）完全堅持，而且，決不可把領袖的動搖透露出一絲陰影來。其實大會上所經過的討論，只是一齣冗長而又怪討厭的喜劇，劇中的角色都是預先安排好的。同時，這些演員又儘是些腐敗透頂的優伶。

因為這個理由，我們對於那些討論的報告，一定得像對付外交文件那樣地研究，步步都得向着這樣的問題：演說人心目中的真意是什麼？牠所粉飾的到底是什麼東西？為什麼要粉飾？但是外交文件普通總是簡單的，而大會報告人的演說，却又長又臭。這種討厭的報告方式，也是官僚們自己保險的一種方法，因為他們的說話中必須容納極多不明確的論斷，同時又要不使人們對於他們的矛盾性發生厭棄。至於在這些論斷中，將來究竟那一個會對他們有

利，那是誰都不能肯定地說的了。除此之外，報紙上的記載，也就壞到極點。在那可以獲得清晰思想與政治意志的地方，假如發生公開的思想鬥爭（這鬥爭常常能幫助思想之確定）則其表現的方式是清楚的，好的與可信的；但當那職業的演說者忙於掩飾他自己的路徑，及其上級的路徑時，或當職業的新聞記者總是很狠狠地（因為生怕遇到暗礁），記載那些亂七八糟的演說時，那末報紙上的記載，總只能把些一般的事件很可憐地加以拼湊。一直到現在為止，我不得不應用的一些人道報上的記載，正是如此。例如我想根據着這些報告，約略地知道一點在目前遠東危機之下日本工人運動的狀況，以及日本共產黨在這中間所起的作用，可是我只能得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日本人對於領袖的熱愛，是用『萬歲！』這兩個字來表示的，但我以前已經曉得這一點了，因為崇敬天皇，也正是用『萬歲！』兩字呢。在大會上，史大林也偶而學着天皇的樣子，在沉默之中保持了他的莊嚴燦爛。

所謂『討論』也者，那是圍繞着兩個問題而進行的，即反法西斯的『聯合戰線』政策，（這是目前僅有的一個政策了）與那二而一的反戰政策。報告人的演說，無論地米脫洛夫那個完整而呆板的報告或埃爾可利的耶穌會派式的詭辯，對於那近幾月來充塞於共產國際的，特別是法國的刊物上的那些莊重的言論，並沒有增添一點新的東西。法國共產黨的經驗成爲大會討論的中心，而且自詡爲值得競爭的一種榜樣。但正是對於那大會上所討論的基本問題，第四國際中的各個組織已經很恰當地表示過了。由莫斯科的辯論中看來，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自己以前關於戰爭，法西斯主義，『聯合戰線』與『人民戰線』諸問題所說的一切，無須作任何修改。

這決不是說我們可以不理第七次大會。決不是的，無論這些辯論是充滿着意識的也好，或是空洞的也好，那大會的本身總代表着工人階級某一部分在其進化中的一個階段。假使只從這一個事實來看，即大會將法國的機會主義轉變加以合法化，牠立刻又要把牠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各地去，那末大會也就具有重大的意義了。大會既然允許——當然是在紙上——各支都有自由的自主權，甚之還命令他們去獨立思想，去適應他們本國的情形，但同時又宣佈在世界各國中，不問是法西斯的德國或民主的那威，是大不列顛或印度，是希臘或中國，一概都帶『人民戰線』，而且無論在那裏都還需要有人民戰線的政府；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個官僚思想的古怪標本。大會之所以重要，因為牠是共產國際經過一時期的動搖與摸索之後，進入其『第四時期』的標誌，這時期中的口號有——『政權給達拉第！』；牠的旗幟是三色旗；牠的讚美歌——是馬賽曲壓倒了國際歌。

無論如何，決議案比那嘈雜的討論，總使我們更能估計那轉變的深度及其關於各國特殊情形中的具體內容。不過，決議案的草案，在某一問題的討論之前并不公佈。討論並不是圍繞着某些確定的文件而進行，乃是無限制地擴大開去的。特別委員會只當所有的演說者聲嘶力竭地讚美了這個領袖，而且整裝待發的時候，才匆匆忙忙地起草決議案。正式的大會總會之後，仍不能得到任何決議，這是前所未有的事。這些工作是留給那些新領袖來幹的，這些領袖在大會之前就已經指定了（地米脫洛夫！），他們盡可能地要來考慮那些尊貴的代表們的語氣與願望。因此，這一次大會的本身結構，就使我們極難對牠的工作加以及時的批評與估計。現在，大會的主要材料總算公佈出來了，我們總算可以得出牠那理論的與政治的比意來了。

。我將盡我的可能，趕快寫一本專門的小冊子，或幾篇論文來執行這國任務。在目前，我想首先要約略地把大會上核准的關於共產國際轉變的幾個政治結論，加以敘述，

在我們這方面，假使以爲『第三時期』的理論與實際，已經整個地與乾脆地被領袖們的『自我批評』所取消了，而且以爲那機會主義的與愛國主義的轉變，已經保證了牠風平浪靜的前途，那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官僚們自己對於那萬丈火箭，雖然是那樣無恥地隨便的不當一回事，但羣衆卻並不如此。他們對於口號的態度是比較的鄭重與真摯。『第三時期』的情態，在那追隨着共產國際的工人之意識中，還是十分生動的。在土倫與白來斯脫的法國共產主義者中，顯然還保留着這種情緒。在某一時期之內，領袖們要和緩普通同志的反對，只能『秘密地』保證他們的誓言，即是說，我們現在正應用一種狡猾的手段，目的在蒙蔽激進黨人與社會黨，等我們奪取了他們的羣衆，到那時，……『那時我們將表示出自己的真面目來』。在另一方面，共產黨之轉變到擁護聯合政府與愛國主義的立場，吸引了許多與工人階級很遠的階層，他們極愛國，而且極不滿意於財政法令，他們把共產黨只看成爲人民陣線中之最有力的一派。這就是說，在共產黨的內部及其周圍，繼長增高地在積集着許多矛盾的傾向，牠們一定會爆發出來，或者會爆發好幾次。因此就發生了第四國際各組織的一個任務即須極度注意各國共產黨的內部生活，以便援助其革命的無產階級傾向，反對那居於領導地位的社會愛國主義派。此派在將來會越來越陷入於階級合作的陷阱中去。

我們的第二個結論就要跳到中間主義的各派及其對於共產國際戰畧轉變的關係。右翼中間主義者分子必然會被這一轉變所吸引，像磁石吸鐵一樣。人們只叫一讀鄂托·鮑威爾，齊

朗斯基，以及俄國門雪維克，但所寫的關於戰爭的提綱，就可以看出正是這些『可貴的中庸之道』的十足代表們，比地米脫洛夫，與埃爾可利更能表示出共產國際新政策的本質。不過還不僅是他們。磁力所及的區域，還更遠的達到了左派。德國社會主義工黨的機關報『新陣線』，在其最近的兩期中，很小心地藏在許多批評與警告的幕後，實際上却在稱許那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的轉變，說牠從教派的硬化中解放了出來，又說牠轉變到『更現實主義』政策的路上。德國社會主義工黨還說在一切原則問題上和我們一致，只在『方法』上不贊成我們，然而當他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是多麼的昏亂。其實在每一個重大問題上，他們的原則立場與我們的總是衝突的。迫切的戰爭危機，使德國社會主義工黨立刻提出了那個『解除軍備』的頹喪口號以反對我們的口號，其實這口號甚之連鄂托·鮑威爾，齊朗姆斯基與但都認為牠是『非現實主義的』而拒絕了的。他們在對於共產國際之進化的估計上，暴露出他們的立場之自相矛盾。當『第三時期』的氣燄達到最高點時，我們曾經絕對明確地預告過，這個極左主義的創傷，將不可避免地引入到機會主義的曲徑中去，牠比之於一切過去的機會主義行動，其為害之烈與程度之深，不知將增加到幾千百倍。當共產國際還在玩弄『革命的失敗主義』之一切花樣時，我們早已警告過了，從『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中，必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社會變遷主義的結論及其一切叛變的後果。共產國際的七次大會，真是很卓絕地證實了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預測。可是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那些什麼東西都忘記而什麼東西都不會學得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的領袖們，對於這個在徵候上早已發見的，一個不治之症的新的與最沉重的階段……却歡欣鼓舞地稱之為現實主義的痊癒。這難道還不清楚嗎，在我們面前是兩個不可

調和的立場？

從上面指出的觀點看來，到底以前對於共產國際最親密的左翼中間主義政黨，即英國的獨立工黨，對於七次大會將發生怎樣的反動，却成爲一個最有興趣的問題了。究竟牠將被七次大會的卑下的『現實主義』（『聯合戰線』，『羣衆』，『中等階級』，等等）所誘惑，或者相反的，將因其事後的而更加致命的機會主義（在『反法西斯主義』這面空洞的旗幟之下進行階級合作，在『保護蘇聯』的掩蓋之下宣傳社會愛國主義等）而發生厭棄？獨立工黨的未來命運，即繫於這一轉變的關頭。

一般地，我們可以說：大會所核准的共產國際的轉變，不問其單另的與部分的階段與插曲如何，牠總是將工人階級運動的情形簡單化了。牠團結了社會愛國主義的陣營，使第二和第三兩國際的各黨接近起來，不管一切地進行組織上的統一。牠加強了中間主義各派中的離心的傾向。這對於革命的國際主義者，即對於第四國際的建立者，展開了更大的可能性。

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

2. 俄國與世界無產階級

對於地米脫洛夫論法西斯主義的報告之決議案，現在總算到了此地。這還是和那報告本身一樣地冗長與雜亂。本文只想談談決議案的第一節第一句，牠在人造報上一共印了十二行，閣時牠却構成了那所謂共產國際的全部理論的與戰策的結構之基石。讓我們更親切些來考察一下吧，究竟這基石是個什麼樣的東西。茲將該句全文摘引於下：『蘇維埃國家中的社

會主義之終極的與不可回復的勝利，這是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牠大大地提高了蘇聯的權力與重要性，使其成爲全世界被剝削者與被壓迫者的堡壘，而且推動了勞働者去爲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資產階級反動與法西斯主義而鬥爭，去爲各民族的和平，自由與獨立而鬥爭。』這句句子中所包含的論斷，彷彿堅決得很，實際上却荒謬到透頂。牠的所謂『蘇維埃國家中的社會主義終極的與不可回復的勝利』，到底是什麼意思？沒有一個官方的理論家企圖着給我們解釋的。決議案的本身也竭知遊免對於這一論斷所基的標準加以絲毫指示。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溫一下馬克思主義的ABC了。社會主義的勝利，特別是『終極的，不可回復的勝利』，只是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的平均生產力，必須高於資本主義工人的生產力。可是蘇聯是否已經做到這個地步，那恐怕連第三國際中最勇敢的理論家不敢加以肯定吧。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希望能用統計數字來證明蘇聯之國家的與個人的收入方面，仍然是很落後的。至於我們目前這個工作，却并不需要這樣的證據。只看蘇維埃政府一定還要堅持着對外貿易的壟斷，就是夠證明蘇維埃經濟雖有很多的成功，但仍舊是落後的。因爲，如果國內的生產消費較低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那末對外貿易的壟斷將成爲贅瘤。最近關於對外貿易的改革，一切淺薄的觀察者以爲放棄了對外貿易的壟斷，實際上只是一種技術的與官僚式的改革，絲毫沒有動搖到壟斷的基本支柱。一方面自從五年計劃與集體農業實行後，蘇維埃的官僚制度是建築於生產工具國有之基礎上的；但在另一方面，蘇維埃的生產品却仍然貴於資本主義的，因此蘇維埃官僚爲要保持其自身的存在，不能放棄對外貿易的壟斷。這一個具有決定作用的事實，即蘇聯勞働生產力之低下，給我們以解決其他一切秘密的鎖鑰。

假使蘇聯的國家收入，能達到北美合衆國那樣的高度，假使官僚制度又不那樣寄生性地浪費一大部分的收入，那末民衆的生活程度將比資本主義國家——連美國在內——都會優裕到無數倍。但實際情形決不如此。俄國的農民，卽占全國人口之大多數，仍舊還陷於深刻的貧困中。就是大多數工業無產階級的境地，也還不會有美國的樣子，甚之還不會達到歐洲的水平。當然，我們誠實地指出這一事實，決計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因爲在資本主義的情形中，我們所指的是一種解體的制度，而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則只是一種初開始的形式。但我們不應該以發展的一般傾向而自滿，而一定要很明確地指出所到達的階段，否則我們將陷於毫無意義的庸俗之中。

假使社會主義的社會能給牠的成員以半保證的好生活，同時又具有一個各人生活不斷改善的前途，那末關於個人存在的焦慮就會消失，而貪婪，焦灼與嫉妬這些惡德，將愈益減少，經濟的集體團結，將自原則轉變爲日常的習慣了。可惜實在情形決不是如此，這是不着証明的；在享有全部特權的蘇維埃官僚之下，造成了一個半特權的勞働貴族；竭力將人與人的關係翻譯成金錢的言語；保障國有財產的嚴酷的法律；最後如反對『有罪』兒童的野蠻的法律，這一切都是以不可否認的方式證明了社會主義在那具有決定意義的場合中，卽在民衆的意識中，還遠不會達到『不可回復』的地步。

假使真像決議案上所肯定的，社會主義已經『終極地與不可回復地』勝利了，那末爲什麼政治的獨裁還要繼續存在？而且爲什麼這獨裁還要日益僵化成爲官僚的拿破崙式的制度，成爲不可忍受的，粗暴的，獨斷獨行的與腐敗的制度？一個有保證的，根深蒂固的『不可回復

的『社會主義，不能要一個全權的，頂上踞着絕對統治者的官僚制度，因為一般地說來，獨裁只是一種方法，牠保存與保護那被威脅的而不是有保證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基礎的。許多『理論家』很勇敢地企圖指出外來的危險以辯解其存在的理由，但這就更加矛盾了，假使我仔細加以考察的話。一個社會，假使其社會主義的結構已經得有保證，牠的内部關係完全基於最大多數群眾的團結之上，那就不需要一個内部的獨裁來保衛其外敵的襲擊了，而只需要一個技術的軍事機關，正如為保持國家的生計只需要一個技術的輕濟機關一樣。

再就蘇維埃官僚所生息着的，且決定其整個國際政策的戰爭的恐怖，也只能由社會主義建設（蘇維埃官僚的基礎），就歷史的觀點說來，尙未得有保證這一事實來加以說明的。工人國家反對那垂死的資本主義的鬥爭，至少得成為國際工人階級之階級鬥爭的一個構成部分。因此，戰爭之對於國家，至少與革命之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具有同樣的意義。當然，我們反對任何『不成熟』的亂動，人爲的引起革命，因為一種不順利的力量關係，只能使我們失敗。而於戰爭亦然。工人國家只當『不成熟』的時候，即當社會主義還未終極的與不可回復地保證之時，才去規避戰爭。那末目前的那種論調，以為社會主義在國內是已經有保證的了，但也許能被軍事力量所摧毀，這簡直是毫無意義的說法；因為具有較高勞動生產力的經濟制度，是不能被軍事方法所推翻的。半封建的歐洲聯盟雖然戰勝了拿破倫，但並沒有破壞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還加速了歐洲其他部分的發展。歷史教訓我們：假使戰勝者的經濟與文化地位低於戰敗者，但他仍然要接受後者的技術的社會關係與文化。所以能威脅蘇維埃這樣的社會主義的倒並不是軍事力量，而是跟在勝利的資本主義軍隊腳後的廉價商品

。再則假使蘇聯的社會主義真像上述那樣地得到保證，即是說，具有較高的技術，較高的生產力，全體民衆較好的生活，較優的團結，那末內部破裂的資本主義國家，根本談不到戰勝蘇聯。

就此，我們可以看到第七次世界大會上的最重要的，實際上具有最決定意義的論據，是多麼的完全荒謬！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這麼說：蘇聯的技術成功是很大的，經濟的成功却落在後面。即令要保證像先進資本主義國中的『好生活』，及重新教育民衆，都還得經過許多年。其實還有內部的矛盾與蘇維埃官僚那種日益增長的破壞作用，其本身尚能把那還未得有保證的社會的成功化爲烏有。資本主義的解體，法西斯主義的突進，日益增長的戰爭危機，這一些過程的向前邁進均比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爲速。只有那心胸狹窄的宣教師與官僚主義的虛信者才能以爲這樣坦白與忠實地確立問題，會窒息國際工人階級的『熱情』。革命的熱情是不能永久滋生於謊騙上的。可是謊騙却形成了共產國際戰略系統的基本支柱。只要世界無產階級幫助蘇聯，使牠和平地生存，那末全世界六分之一地面的蘇聯，已經保證了社會主義了。因此，他們的口號不再是準備國際革命而且『保障和平』。從這裏就發生了與『和平之友』的聯盟，以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與財政資本的激進黨建立人民戰綫等等。就是這些方法的本身，早已不能延長和平，更不談和平的保障。但是共產國際的整個和平綱領，戰略上是建立在內部已有『保證』的社會主義之前提上的。第七次大會在這個前提站起來而跌倒了，牠如上面所提出的，是不可改正地錯誤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

史大林的有機過程（中國的經驗）

赫羅斯基

不久之前，史大林派罵我們爲『社會法西斯』，『反革命者』，『韋爾斯的走狗』。爲什麼呢？因爲在希特勒勝利之前，我們在德國宣佈與社會民主黨締結聯合戰線，俾德國無產階級能在國會外的大鬥爭中反對法西斯主義。在這聯合戰線中，我們想把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變節態度，暴露於其本黨的羣衆之前，因而取得其羣衆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對於這一策略的否認，即爲希特勒勝利的理由。

可是現在却又換了一個腔調，特別是在法國與比利時，即在那些正處於階級鬥爭的緊張時期，或在這種鬥爭之前夜的國家中，他們就叫我們爲『冒險主義者，極左派，盲動主義者』。不過這個腔調毫不新奇。你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共產國際』（以前是革命馬克斯主義的機關報）上，可以找得到史大林，布哈林，馬爾可諾夫等人的許多妙文。用冒險主義與盲動主義的謾罵來攻擊俄國的反對派。

在這裏，就不禁令，想起在史大林主義的目前政策與另一時期的政策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實際上，那時，史大林與蔣介石左右的軍閥們聯盟，隨後又叫中國共產黨服從着汪精衛，陳友仁等人的左派國民黨的指揮，這不是與目前蘇聯與法國參謀部建立聯合戰線，另一方面又令法國共產黨臣服於达拉第，高脫，與弗老脫等人所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的激進社會黨，適相符合嗎？十二年之前，史大林爲要以俄國革命的權威，使中國的無產階級羣衆入於國

民黨的旗幟之下，乃派鮑羅庭與加倫到中國去；而對於目前的法國也是如此，他爲要叫法國無產階級受社會激進黨的指揮，派遣了他的比亞塔次基，欠毛唐諾夫，考沙洛夫到法國。誠然，他們的權威，幸而已沒有在中國革命那麼盛大，因爲德國黨的不光榮的失敗，已使一部分的先鋒隊看到了史大林派政策的結果。但是正因爲此，危險性却更大。轉變的史大林主義者尤其從屬於社會黨的首領，則愈將浸沉於階級調和的思想。因此，把中國革命慘敗的教訓，在西方廣爲傳佈，已成爲一個必須的與現實的任務了。這真是一件要緊的事情，因爲史大林派企圖把他們在法國的現行政策，解釋爲『德國失敗的教訓』。史大林怎能消受歷史的教訓呢！當他在德國的極左主義的把戲失敗以後，同樣是爲了外交政策的利益，於是又循着那有機的過程，重找他的舊歡，即重找那更爲平庸的社會機會主義了。

史大林在一九二六年的政策之出發點，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只是從俄國的觀點出發，在蔣介石，馮玉祥等軍閥們的身上，想找一個國外的強者，在目前的法國亦然，他決不是爲了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俄國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影響，成爲他與蔣介石聯盟的代價，而目前俄國對於法國無產階級的影響，又成爲他與法國總參謀部交涉時之一種討價還價的東西。

現在讓我們就幾個基本的特點，將中國革命加之簡單的視察。兩國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諸方面，雖有不同，但我們顯然還有權利將法國的現狀與那時的中國，作一個對比。『反帝國主義』這一個名稱用以辯護史大林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政策。布哈林將國民黨加以榮光，說牠能代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與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爲了反帝國主義這個『公

其鬥爭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拋棄牠獨立的政治立場而接受國民黨的指揮。史大林及其同僚完全看不到大農與買辦的資產階級，乃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民衆中的支持點，他們看不到假使反帝的鬥爭，不是覺醒的勞苦大眾爲本身利益的鬥爭，即不是土地革命與剝削那帝國主義走狗，買辦的鬥爭，那就無法前進的。

史大林所選擇的同盟者不是無產階級，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要同帝國主義妥協的心更百倍的基於在土地革命的旗幟下舉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貧農，因爲有了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恨蔣介石及這類的軍閥。史大林只有制止無產者反對蔣介石才可以得到與蔣介石的同盟。然而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能和蔣介石親善，因爲蔣介石仇視共產主義施行一個太明顯的壓迫，並且一九二六年在廣東「三月二十」的事變中就已纒開始拘捕共產黨員。史大林「鮑羅廷，雖然有蔣介石對共產黨員的敵視，仍不願與他決裂，因之必須找一個中間人以維持對無產階級的控制。只有這樣提出問題，我們才可懂得『左派』國民黨小資產階級的和調和派的領袖們（如汪精衛，陳友仁，宋慶齡之流）之作用。他們自命爲階級合作的代表，以統一的中國人民對待主要的敵人帝國主義。史大林「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爲發言人，在無產階級之前稱讚國民黨『左派』的領袖爲全中國民族之有資望的領袖。如果中國的無產者不滿意蔣介石，鮑羅廷便使之平靜下去：『不錯，蔣介石是不好的，但汪精衛等是頂好的，不應該惱怒他們』。殊不知國民黨『左派』領袖，正因其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盡調停的職務，便反對一切與蔣介石的決裂。這樣的機械的體系便使中國軍隊（共產黨員佔百分之五十）維持在反革命的軍官指揮之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受史大林，

鮑羅廷的指導，避免一切反蔣介石的嚴重的鬥爭，一直到蔣介石抓住一個便利的機會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送到血泊中為止。

另一段有趣的歷史是這樣：當事情已經太晚了，革命的失敗已經成就了，才改變路程以挽留臨陣脫逃者，下一道「革命」策畧（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意思，是冒險主義和盲動主義的）的命令，並以諾曼之流代替鮑羅廷之流。此時國民黨「左派」領袖所可做的就是逃遁到蔣介石的營壘中或在中國消失了。他們的社會重心表現出等於零。這些階級間的調和者之政治的腳色，只有在平靜時期才有他們的位置，革命就是他們所要陷落的地坑。然而爲者不要對於「零」的依靠，莫斯科便放棄了革命。

介乎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的調和者在一個深徹的社會危機的時候便完全消滅——這個事實，亦同樣爲德國民主黨（後來是政府黨）的命運所證實。到決定的時候，在法西斯主義和無產階級之間，絕對不存有的社會基礎。然而它的領袖（如海爾莫崔，方日列里之流）以標賢人的資格爲社會民主黨的「鐵的戰線」服務（附帶的插問一句：在法國的所謂共產主義者現在的政策和麥爾斯，斯坦佛及其同僚在前希特勒時期中已經判了死刑的政策之間有什麼不同呢？）。

今日在法國的事實是怎樣呢？磨化成波那巴特主義的蘇維埃官僚，傾心於與法國的憲謀部結合，而不與法國的革命結合。然而人們不能向那從事運動的羣衆表示麥謀部爲他們利益的保護者。應該有一個中間人。因爲缺乏更好的，人們便與激進社會黨的「左派」領袖（達拉第，高脫及弗洛脫）做統一陣線。法國羣衆已經開始脫離那些對危機表示絕對無能的，說漂

高漲的激進派。社會黨被逼着要斷絕他與激進派的同盟並與它自己的右翼分離，以便不失去與無產階級群衆的關係。而現在莫斯科的轉變居然引導法國工人階級在這同一的激進派的領導之下。所有這些都是在「反法西斯」的旗號之下。但是如在中國與國民黨同盟阻止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嚴重鬥爭一樣，現今與激進派的同盟便阻止一切反法西斯主義的嚴重鬥爭。不僅陶寧斯和勃龍姆會隨處在達拉第之後，宣佈一切生產手段的國有和社會化的鬥爭爲不可能，同時，一切「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都會以同樣的態度，去妨碍那對危機作唯一有效的鬥爭，可及這個危機正就是產生小資產階級的貧困及相因而至的法西斯制度的。並且在政治的戰場上，與激進派聯盟要使一切反大資產階級代表的嚴重鬥爭成爲不可能，而這個大資產階級是密切地聯繫於法西斯的黨徒。依照中國的模範，曾產生以下的喜劇：

是的，但是赫里歐是無產階級的一個敵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提出抗議。『不錯，赫里歐不完全令人滿意的，但達拉第和其同僚，却是我們的朋友』——陶來斯和勃龍姆便這樣向勃龍姆訴說。『賴伐爾確實不是好的，但他較優於樂格（法賽斯首領——譯者）應該『合作』——赫里歐這樣向達拉第答辯。『應該擁護樂格，應該增加我們的重量以抵抗平』——賴伐爾這樣教誨赫里歐。可是在這期間，樂格公爵準備槍殺那受達拉第，勃龍姆——陶來斯催眠的無產階級。

一個對比完了。我們的結論是：終止與激進派的聯盟，因這個聯盟不是加強無產階級的陣線，而是削弱無產階級的陣線，並準備法國的蘇介（樂格公爵）之勝利。階級對階級，

這就是我們的口號。史大林派回答說：『冒險主義，盲動主義』？但是歷史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黨徒不都受過那些小資產階級的調和派及社會的機會主義者（自路易勃朗，却次，崔列脫列到考茨基和希爾費丁）之同樣的咒罵嗎？陶來斯和勃龍姆之流，以及整個的『共產』國際在法國的階級衝突中採取俄國革命中右派孟雪維克的立場。『無產階級營壘中資產階級的代辦，助手』——列寧這樣形容這些人們。我們也這樣看待他們。

誰保護蘇聯，誰幫助希特勒？

托洛斯基

比利時史大林派的可憐的領導者——若克摩脫，向比利時社會黨左派的領袖華爾脫·道奇，提出如下的問題：假使希特勒進攻蘇聯，他是否『出馬』？在這種提出問題的方式中，我們一下就可以發見那庸俗人的完全平凡的思想。此地這『出馬』兩字，指的是什麼意思呢？假使比利時聯合了法國向德國進攻——這當然不是爲了民主或對蘇聯的友誼，而是純粹爲了帝國主義的目的——假使道奇又願服兵役，那他就不『出馬』不可。卽令比利時決定去參加反蘇聯的聯盟，那他的同樣的非『出馬』不可。假使比利時保守中立，那末道奇就無法『出馬』了。很聰明的若克摩脫及其跟隨者與法國，捷克和其他各處的同事們，簡單地忘記了戰狗究竟該在何時與何種情形之下放縱出來，那是由壓迫人的資產階級，而不是由被壓迫的工人來決定。

凡陽·古多利想提出這樣的一個意見來解決這個『小小』的問題，他的意見是：『我們是現實主義的政黨，是一個政府黨』。誠然，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我們必須分別出無產階級政府與資產階級政府。要實際地成爲政府黨，則必須以革命的暴動，推翻政權，且組織我們自己的軍隊，紅軍。那時，也只有那時，我們才能決定，我們是否『出馬』，與爲什麼而『出馬』。史大林派的『理論家』——請允許我們應用這個名稱吧——現在就越來越抹煞那奪取政權的主要問題了。他們在保護蘇聯的藉口之下，將工人階級與他的死敵——民族資產階級等量齊觀了。這是理論上最後完成的一種叛變。假使我們繼續在法國，比利時與捷克等國

中推動階級鬥爭，那末史大林派及其崇拜者會那樣的回答我們，說我們減弱了蘇聯同盟者的力量，損害了蘇聯自身。其結果則不論我們的主觀如何，希特勒必然增強了。我們不能預言階級鬥爭將在何時奪取政權。可是希特勒却很可以在我們奪取政權之前，得到了戰爭的勝利。希特勒做了歐洲的統治者，將延遲或摧毀我們全體的鬥爭（法比捷等國）。所以繼續我們階級鬥爭的活動，勢必實際上幫助了希特勒。

這一種論理上似乎很能自圓的解釋，不過重覆了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愛國主義者（即社會帝國主義者）的老調，他們時常用以反對那敵對的革命者的。李卜克內西以前不是被稱為沙皇的走狗，而列寧不會被誣為霍享索倫的偵探嗎？這樣的事情多到不可勝數。

有人或許會這樣來反駁我：那時還沒有蘇聯呢。是呀，這話很對。但這事實只能證明那社會愛國主義的思想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這個最偉大的歷史事變却沒有將社會愛國主義者的特別淺薄性加以絲毫的改變。

當大戰之時，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僅是那些僱傭的壞蛋，誠實的工人也是如此——都說：如梟沙皇戰勝了，那末他的哥薩克騎兵將解散我們的黨，破壞我們的工會，毀滅我們的報紙與房屋了。普通的法國工人，也是很信任地聽着雷諾德爾，加興等的宣言，叫我們從德皇和他的軍官們的進攻之下保護共和國與民主主義。至於蘇維埃國家的存在，並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牠是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行動而產生的。保護蘇聯——對的——但我們還必須保護資本主義國中的勞働組織。這兩個任務在政治上是合而為一的，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都很密切地聯繫着。保護目前存在着那樣的蘇聯——關於這，我們與陶里奧，脫蘭脫，等的學

說沒有共同之點）正像我們保護任何勞工組織（雖然牠是被更壞的改良主義者所領導的），去反對法西斯主義與軍事反動的進攻一樣，都是我們不容拒絕的任務。整個的問題只是在「怎樣保護與用什麼方法來保護？」

馬克思主義者說：只能用那些受我們所控制的方法，我們能自覺地應用的方法，即是說，只能用各交戰國內進行革命階級鬥爭的方法。不論戰爭的命運如何，革命的階級鬥爭，最後總能予工人階級以最好的成果。這無論用於保護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工組織與民主機關，或用於保護蘇聯，都無二致。我們的方法在根本上並無差異。無論在何種情形或任何藉口之下，我們都不能將我們的革命任務交給我們那民族資產階級的手中。

但是，這些聰敏的俗人們會那樣回答我：這一切在「理論上」也許是很好的。可是誰能不同意：在法國進行階級鬥爭會加強希特勒的地位，會增加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且能增加希特勒在此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機會？而法西斯的德國不是蘇聯的主要敵人嗎？蘇聯的失敗，不將長期地推遲世界革命的發展嗎？這種論據，又不過是那夏德曼，韋爾斯，樊迪文，德曼，嘉興這類人的老調重彈，是一種完全錯誤的論據。只要把馬克斯主義批評這一個魔術棍拿去一擊，牠就會打得粉碎的。

法西斯主義不是別的，只是擠到最高權力而且賦與神秘主義的階級利益調和的觀念。假使法，比，捷的工人團結在「他們」的資產階級之周圍，則必然的要驅使德國工人團結在國社黨的左右。社會愛國主義只能給種族主義的轉動機加油。要滅弱希特勒的力量，就得煽起階級鬥爭的火燄。歐洲國家中任何一國的偉大的工人運動，比之於蘇聯與其他國家的結合，更

能破壞種族的瘋狂的軍國主義。蘇聯與其他強國訂立反德的聯盟，這是予瘋狂的種族主義以新的武器，且使那衝突的帝國主義國家倒向德國那方面去，因為他們所關心的不是什麼民主主義與蘇聯，而是赤裸裸的勢力的均衡（如波蘭，日本，英國等）。

假使與蘇聯聯盟（多久呢？）的國家中之無產階級在戰時必須幫助牠的資產階級，那末這一個政治路線一定在和平時就得開始了。因為我們在阻止希特勒的勝利之前，先得避免戰爭本身的爆發。這就是要在和平的時候，去幫助那反對希特勒的帝國主義國家及早得到優勢。可是這却不多不少地正是完全拋棄了階級鬥爭。而這又正是那不名譽的史大林宣言的主旨。他在目前，在和平的時候，贊成了法國的——當然也是比國與捷克的——資產階級之軍事罪惡。此外還能有什麼別的作用呢？

假使我們不能以階級鬥爭的方法，減弱與蘇聯同盟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加強人民對於其統治的信心。那末，假使受着本國無產階級之擁護的法，比，捷克的軍國主義，在其戰爭的進程中，掉轉他們的槍頭去對準蘇聯——這是很能想像與很可能的一種發展——我們將怎麼辦呢？如果我們自己騙自己，以為在這個時候，我們能強烈地反對他們，那簡直是瘋傻的說法。龐大的羣衆是不能實行這種劇烈的轉變的。軍國主義在我們幫助之下所取得的權力，不能這樣容易地棄掉。在這樣的情形之中，我們所處的地位，不僅會使我們成爲消極的，而且是積極的破壞蘇聯的代理人了。

不過從這些前提中，史大林派却很遲疑地做出他們最後的結論。爲要保持他們國會反對派的神氣，他們高呼着法國的參謀部中有法西斯蒂。這種論據只證明了史大林派社會愛國主

義的整個空虛與愚蠢。講到要利用帝國主義間的衝突，那末利用這一法西斯的集團去反對另一法西斯的集團，都是可以辦到的。莫索里尼是法國的同盟者，現在當然也成爲蘇聯的同盟者了。其實德，法的衝突，決不是法西斯反對民主主義的衝突，而是飢餓的與過飽的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這衝突，即使法國自身變成爲法西斯蒂，也還是存在着的。

法國共產黨以爲假使軍隊中『肅清』了法西斯的份子，他們準備投票贊成帝國主義的軍隊，這證明他們已經和勃龍（社民黨首領——譯者）無異了，他們所關心的不是什麼蘇聯，他們唯一所焦慮的只是法國的『民主主義』。他們立下了崇高的目標，要把純潔的民主主義注射進凡爾賽軍隊（凡爾賽一詞的意義，含有公社的與凡爾賽條約兩層）的軍官團中去。怎樣注射呢？經過達拉第的政府。『到處建立蘇維埃！』『政權給達拉第！』但是，這位偉大的民主主義者達拉第，做過兩年軍事部長（一九三二——三四年），爲什麼一點也不設法去肅清軍隊中的法西斯蒂，拿破倫主義者與保皇黨人呢？是不是因爲那時的達拉第，還不會受人民戰線的魔水的洗禮呀？也許那聰敏與誠實的人道報會給我們解決這個啞謎吧？牠還能回答我們吧；爲什麼達拉第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武裝反動之第一觸壓迫之下就投降了？我們可以替他們回答嗎？這因爲激進社會黨是財政資本各黨中之最卑劣，最懦弱與最奴性者。只要希內特，羅契爾特，邁爾西愛等先生的脚跟一頓，激進黨人總是會跪下來的，首先是赫羅歐，一會兒之後，達拉第也就跟着跪下去了。

讓我們假定着，人民戰線能取得政權，並且表演式地（就是爲了欺騙羣衆）能把次等的反動分子從軍隊中肅清出去，還能解散（紙上空談）幾個有組織的匪棍團體。那末根本上能有什

麼改變嗎？軍隊呢——那時也會和現在一樣——將仍舊是帝國主義的主要武器。軍隊的總參謀部，也仍然是以軍事陰謀反對勞働者的大本營。當戰爭之時，軍官團中之最反動最堅定與最無情的分子會取得優勢。意大利與德國的例子，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大戰乃是訓練軍官的一個最好的法西斯學校。

更次，那些對蘇聯態度尙未明顯，戰爭立場還是一種秘密的國家，又是怎樣呢？不列顛的工會運動，早經在阻碍牠對自己的帝國主義者鬥爭了，他們的理由就是大不列顛也許會被迫去保護蘇聯的。這些鬼祟的政治家，自然會求助於史大林，不僅很奏效，而且還很合理呢。假使法國的史大林主義者能夠答允去「控制」他們自己資產階級的外交政策，那末英國工黨當然也能玩這套同樣的把戲。可是波蘭的無產階級又該何所適從呢？因為波蘭的資產階級和法國是聯盟者，而對德國又要表示最親密的友誼！

無論你用何種藉口都好。總之，國內和平的政策，總是表示將社會主義者對於帝國主義的最卑賤的臣服，尤以帝國主義進行其最血腥氣的最恐怖的工作時爲然。上一次大戰，已經表示出愛國主義的結果了。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從那「國內和平」的學校裏出來，完全沮喪了，政治上已經毀滅，他們沒有信仰或勇氣，失去了名譽與良心。德國的工人在戰後已經取得了政權，可是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却把牠交還給將軍們與資本家們。假使法國的勞工領袖們當大戰之結果不像是卑劣的政治上的廢人，那末今日的法國也許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領土了吧。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國內和平，不僅給全世界的民衆判定了前所未聞的犧牲與負

擔，而且又讓那腐敗的資本主義延長了幾十年的生命。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利於『本國民族』的國內和平，只是準備了一次新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戰爭有使各民族完全滅亡之虞。不管目前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在何種口號（『保護祖國』，『保護民主』，『保護蘇聯』。）之下去準備那新的『國內和平』，總之這一新叛變的結果，將使現代文化完全瓦解。

× × × × ×

當然！蘇維埃的官僚制度需要保護蘇聯，同樣的也要建設社會主義。不過他們之從事此種工作，乃是按照了他們自己的方式，這種方式與國際的利益，因而也與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有極大的矛盾。這種官僚制度不信任國際的革命。牠只看到危險，困難與後退，而看不到那偉大的可能性。至於法國●比利時以及全世界的史大林的應聲蟲，那對他們自身或對他們的黨都沒有絲毫的信心。他們把自己不看成——其實正是如此——革命群眾的首領，而只是在這些羣衆講台的面前，做蘇維埃外交的代理人。他們之升沉，完全與這外交相一致。

因此，第三國際的官僚們，由其內在的機構，就不能在戰時反對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者。所以這班卑怯的壞蛋如嘉興，若克摩脫，高脫華爾特等，總是用盡一切可憐的藉口，以圖掩蓋他們對於那愛國主義『輿論』之狂流的投降。這樣的藉口，——只是藉口而不是理由——他們在『保護蘇聯』這口號上找到了。多利奧具有嘉興與杜克洛斯一樣的政治面貌，他是同一學派中的產物。雖然聖但尼斯小學的孩子都知道；法國資產階級與希特勒的諒解，其方向一定是反對蘇聯，可是多利奧却多麼容易地和『保護蘇聯』的思想決裂，而代之以『與希特勒的

諒解』！這樣的一位先生只能愚弄史大林派的官僚，同年又很快地會背叛蘇聯。這些政治家們只缺少一件小小的東西——脊骨。他們在史大林小組織的前面卑躬屈膝，只是在訓練他們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順從。

因為他們的特徵就是出奇地無恥，他們就急劇地轉過來攻擊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罵我們擁護希特勒。他們忘記了希特勒是只能被德國的工人階級來征服的，而這個階級因為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罪惡，現在已組織潰散，完全無力了。但牠是會再度起來的。為使牠重新站起腳來，使牠具有生氣，那末一定要發動國際的，特別是法國工人運動。

勃龍，齊洛姆斯基，陶來斯等的每一個愛國主義的宣言，就是給種族學說（民族主義）以一份新的糧食，其最後結果則幫助了希特勒。世界無產階級之不妥協的馬克斯主義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無論在平時戰時，都揭穿那瘋狂的種族理論，因為牠在行動上證明出人類的命運乃是由階級鬥爭而不是由民族戰爭來決定的。這難道還須加以證明嗎？第三國際追隨着第二國際之後，最後地把那反希特勒的『共同』進攻代替了階級鬥爭。還在實際上，只能幫助希特勒主義。現在已經有無可爭辯的事實與數字來給我們證明了，例如奧國國社主義的生長，薩爾的投票，布希米亞的選舉。用民族主義的武器來反對法西斯主義，只是火上加油。而法比，捷克或任何地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之初次真實的勝利，在希特勒的耳中所來，將是喪鐘的響聲。誰如想談社會主義的問題，那誰就該懂得這一點ABC。

如因無產階級的軟弱，發生了戰爭，其結果如何，我們不能預言。陣線將變動着，國家的疆界也將震撼。航空技術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一切邊界將被破壞，一切國家的領土將被

摧殘。只有那最赤裸裸的反動者，（他們時常戴着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的假面具）才能在這種情形之下，號召勞働者去聯合『牠的』資產階級以保護『牠的』陣線。勞働者的真實任務，乃在利用資產階級戰爭的危難，推翻牠的統治，縱而廢棄那室害工業與文化的國家疆界。

在戰爭的第一個時期，資產階級是最有力量的。但在戰爭的持續中，牠的力量却與日而俱減。在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只要牠能對愛國主義的豺狼保持獨立，那牠的地位與力量，將不僅是每日地，而且是每小時地鞏固與增強起來。在最後的分析中，戰爭的命運不是取決於戰線，而是由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只有那勝利的革命，纔能補償戰爭的禍害與紛擾。那時不僅是法西斯主義！就是帝國主義也將受着致命的打擊。那時不僅蘇聯外部的敵人將被擊敗，就是那產生史大林死黨的野蠻獨裁之內部矛盾，也將被克服下去。無產階級專政將聯合起我們這支解的與無血的大陸，牠將挽救那瀕於危殆的文化，將建立歐洲的蘇維埃聯邦。牠將侵入美洲，且能推動東方被壓迫民衆的興起。全人類將聯合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且建立起一個諧和的文化。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蘇聯之現狀

托洛斯基

工人國家，特米多問題與巴拿帕特主義

史大林官僚制度之對外政策，無論在其主要的外交方面，或在其輔助的共產國際方面，都已急劇地轉向於國際聯盟，傾向於現狀的維持與和那改良主義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聯盟。同時牠的對內政策，則轉向於市場經濟和『富裕的集體農民』。最近對於反對派與半反對派，以及對於那些至少還帶有一點批評精神之個別分子的新的進攻，和新的大批清黨，其目的正在使史大林能夠自由地採取向右的路線。這裏所牽涉的問題，主要是回到了舊日的有機過程（完全依靠富農，與國民黨聯盟，英俄委員會等等），不過是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和處於更煩艱的條件中罷了。這過程將引向何處去呢？『特米多』那個名詞，重新又從許多人的嘴上聽到了。可惜這名詞却已經不中用了。牠已經失却其具體的內容，牠顯然非但不適於說明史大林官僚政制目前所經歷着的階段，並且還不適於估計牠所準備着的災難。因此，我們首先得弄清楚我們的術語。

過去對於『特米多』的爭論

『特米多』的問題是與蘇聯左派反對派的歷史緊相聯繫着的。現在要來證明究竟誰首先不

應用『特米多』這一歷史的類比，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無論如何，一九二六年中對於這個問題之各種立場，大概總可歸結如下：『民主集中主義者』（史米爾諾夫，沙潑朗諾夫，以及其他史大林放逐至死的許多人）聲言：『特米多已是一個完成了的事實』！而贊成左派反對派政綱的人，即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則絕對拒絕這種說法。兩者的分裂，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究竟事實證明誰是正確的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確切地規定每個派別本身，對於『特米多』所了解的意義。蓋歷史的類比容許有各種的解釋，易被濫用。

業已去世的史米爾諾夫（他是老布爾塞維克派中最好代表之一），認為工業化的遲緩，富農和新興資產階級的生長，新興資產者與官僚的勾結，以及黨的墮落，已經發展到很深的程度，以至於如果沒有一個新的革命，則回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已經沒有了。無產階級已經失掉了政權。左派反對派被鎮壓以後，官僚制度將開始代表那再生的資產階級制度的利益。十月革命之基本的勝利品已經被取消了。這些就是『民主集中主義者』之主要立場。

左派反對派駁道：雖然兩重政權的成分，無疑地已經開始在國內滋長，但是這些成分假使要轉變到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却非經過反革命的暴動不可。官僚制度已經和新興資產者與富農聯繫起來，但其主要的根源，却仍舊生長在工人階級之中。在其進行反對派左反對派的鬥爭中，官僚制度的後面，無疑地拖帶着新興資產者與富農這一個笨重的尾巴。但在明天，這個尾巴却會掉過來打擊腦袋，却打擊那站在統治地位的官僚制度。所以官僚隊伍中之新的分裂，乃是不可避免的。在反革命暴動這一個直接危險之前，中派官僚制度中的基本核心會似持在工人的身上，去反對那日漸發長的鄉村資產階級。此種衝突的結果，雖決定之期尚遠

。故將十月革命埋葬，乃是不成熟的舉動，~~左~~派反對派之被摧毀，雖令特米多的工作易於完成，但特米多却並未就此實現。

我們只須將一九二六——二七年爭論的要點，加以明確地觀察就夠了，因為以後事變的發展，已經從各方面證明了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立場是正確的。早在一九二七年中，富農就給了官僚制度以一個打擊，他們要將麵包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拒絕供給官僚制度。一九二八年，官僚制度發生了公開的分裂，右派主張繼續對富農讓步，而與右派共同摧毀了左派，同時却拾取其思想之殘滓的中派，則得到了工人的援助，打敗了右派，走上了工業化，後來又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十月革命所爭得的基本的社會的勝利品，付與了無數不必要犧牲的代價，最後總算又得到了保存。

布爾雪維克——列寧派的預言（寧可說是他們預言中之『樂觀的可能性』，更加正確些）是完全給證實了。現在對於這一點已無可爭論。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向回復私產制的路上，而是在社會主義化的基礎上，在計劃經營的路上前進的。這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只有那政治上的盲目者，才會熱視無睹的。

特米多的真義

不過，現在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承認這一特米多的類比，不能用以廓清問題，而只能使問題模糊。一七八四年的特米多使政權由國民會議中的某一部份人轉移到另一部份人的手中，即從勝利『人民』之某一部份移轉到另一個階層。那末特米多是反革命嗎？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要看我們在某一種情形中，對於反革命這一個觀念，付與如何大的意義。自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之社會變革，在性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在本質上牠只不過將固定性的封建財產代之以『自由的』資產階級財產。就這一個革命來說，反革命的意義將是指封建財產的回復；可是特米多在這一方面，甚至於連企圖都沒有。羅伯斯比爾在工匠中得到他的支持者，執政部自中等的資產階級中，得到他的擁護人。拿破崙自己則與銀行相聯合，所有這些轉變，——當然不僅具有政治的，而更具有社會的意義——但都是在新的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國家之基礎上發生的。

特米多是在革命的社會基礎上一種反動性的行動

巴那帕特的勃魯美月十八，即反動道路上的第二個階段，也具有同樣的意義，兩者的問題，都不是關於舊財產形式的回復，或過去統治階級政權之回復，而是在勝利的『第二階級』的各部份中，分配那新社會制度的獲得品。資產階級對於財產與政權愈取愈多，（或以直接了當的方法，或經過像拿破崙那樣的特殊代理人）但從不曾企圖反對革命的社會勝利品，相反的，他誠惶誠恐的想來加強，組織與鞏固牠們。拿破崙保障資產階級的與農民的財產，同時在另一方面他卻又反對『暴徒』，以及被剝削的所有者們之要求。封建的歐洲憎恨拿破崙，把他當做革命的活的化身，這依其觀點來說原是對的。

對於蘇聯之馬克斯主義的估計

目前的蘇聯與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描寫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沒有永久的官僚制和永久的軍隊，對於民選官吏隨時有撤換之權，群眾中『無論何人』對於官吏有積極監督之權等）當然很少有相似之點，官僚制度之統治國家，及史大林之統治官僚制度，差不多已經達到絕對完成的地步，但是從這裏應該得出怎樣的結論來？有的人說，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實際的國家，並不與理想的『先天的』原則相符，因此他們把背脊轉向于牠，這是政治的勢利觀念，是和平主義的民主主義者，自由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極左派，所共有的觀念。另外有一種人說，因為國家是從無產階級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對牠的任何批評都是一種褻瀆的行爲與反革命，這是偽善的呼聲，在他們的背後時常隱藏着某一部份人直接物質的利益，這些人也就是屬於同一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或者是屬於工人的官僚。這兩類人——政治的勢利之徒與政治的偽善者，時常因其個人的環境而互易地位。讓我們把這兩種人都丟開吧！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這樣說：目前的蘇聯顯然與那蘇維埃國家的『先天的』原則不符，但是讓我們來發現：究竟在我們草擬那些政綱式的原則時，什麼東西是沒有預見到的，讓我們再來分析；究竟是什麼社會的因素使工人國家走入了迷途。讓我們再來查考一次，究竟這些迷誤是否已經深入到國家的經濟基礎中去，——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的社會勝利品，是否還是保存着，假使他們還是保存着的，那末他們將向何種方向改變，並且是否能在蘇聯以及世界的範圍內，得到些因素，他們可以使進步發展的傾向，超出於反動的前進。這樣來了解問題是很複雜的。牠能給懶於思想的人們所愛好的那個現成的鑰匙。這種現成的鑰

是僅能保存兩種禍害——勢利和偽善——之一，同時他還能給人們以積極影響蘇聯命運之可能。

當『民主集中主義』派在一九二六年宣佈工人國家已經被毀，顯然是將還活着的革命加以埋葬了。左派反對派與他們的立場相反，起草了一個改造蘇維埃政制的政綱。史大林官僚爲要保證其成爲一個特權的階層，於是摧毀了左派反對派；但當他爲自己的立場而奮鬥時，他覺得如果要救護蘇維埃國家的社會基礎，只有從左派反對派的政綱中取得一切的方法才有可能。這是一個最可寶貴的政治教訓！他表示出這樣特殊的歷史條件，表示出農民的落後，無產階級的疲倦，從西方來的有力指示之缺乏，對於革命中第二章的準備，其特徵即在於以保守的民族官僚制度壓迫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及摧毀革命的國際主義者。但是這一個同一的例子，又表示出一個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怎樣地能使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分派，甚至在『第一章』的勝利者踐踏了『第一章』的革命者的時候，還能對事變的進展上，產生很多的結果。浮淺的唯心主義的思想方式，只會引用一些現成的原則，機械的將事變發展的活的過程適應上去，很容易使人從熱情走到失望，只有辯證的唯物論，牠叫我們的事變發展的過程中，及在內部力量的鬥爭中，去觀察一切存在，使能叫我們堅定的去思想與行動。

無產階級專政與官僚專政

在過去的許多文章中，我們曾經確定了這樣的一個事實，蘇維埃社會雖然因生產工具之國有化，而得到了很多經濟上的勝利；但他仍舊十足的保持着一種矛盾的過渡性質，且就勞動者的地位，生活條件之不公平，以及官僚制度之特權看來，牠純然更近于資本主義的制度。

而遠于未來的共產主義。

同時我們又確定了這一個事實，蘇維埃國家雖然有可怕的官僚制的墮落，但牠仍然是無產階級的歷史的工具，只叫牠能夠保證在生產工具國有的基礎上，以發展經濟及文化，並藉此來消滅官僚制度與社會的不平等以準備勞動者真正解放的條件。

誰假使沒有鄭重的思索了並接受了這兩個基本的命題，誰假使一般的沒有研究過一九二三年末布爾塞維克——列寧派關於蘇聯問題的文獻，那他就難以了解一切新的事件，並且會放棄了馬克斯主義的分析，而從事於下賤的悲嘆。

蘇維埃的（更正確些說，是反蘇維埃的）官僚主義是城市與鄉村間，無產階級與農民間（這兩種矛盾並不是同樣的）民族的共和國與區域之間，農民的各派之間，工人階級的各層之間，消費者的各派之間，以及最後在整個蘇維埃國家以及四週的資本主義環境之間那些社會矛盾的產物，現在一切關係都繙譯成貨幣計算的言語，於是經濟的矛盾就以特殊尖銳的形式而置於最前列。官僚制度高踞在勞動群眾之上，調整着這些矛盾，他憑藉着這種作用，以圖加強他自己的統治，更因其無統制的與一任己意的統治，不藉助於任何力量，官僚制度壟積了新的矛盾。牠利用着這些矛盾，建立起官僚絕對主義的制度。

官僚制度自身的矛盾，使牠產生了一種以極少數人組成的總參謀部的制度。因特殊階層內部對於紀律的需要，就產生了個人的統治，與永久領袖的習慣。在工廠，集體農場，大學與政府中都通行着同一的制度：一個領袖站在他忠誠的部隊之上，其他的人服從於領袖。史大林永遠不會是，而且由於他的本性，也永遠不能是一個羣衆的首領，他是官僚領袖們的首

領，是他們的最後的結果，他們的人格之化身。

經濟的任務愈複雜，民衆的要求及其利益愈巨大，官僚制度與社會主義發展的要求之間的衝突愈加尖銳，那末官僚制度爲牠保存自己的地位而進行的鬥爭將愈加粗暴，牠之藉助於暴力，諷蔑與賄賂的手腕將愈加赤裸。

一方面經濟與文化日漸增長，而另一方面則政治制度經常的惡化。這一個嚴重的事實，在這裏，也只能在這裏，才能找到牠的解說：即目前的壓迫逼害，大部份並不是用於保護國家，而是用於保護官僚制度的統治與特權。這也就是他們愈來愈需要用諷蔑與混淆黑白的言語，來掩蓋他們高壓的緣故。

『但是這樣的國家可稱爲工人的國家嗎？——道德家，唯心主義者與『革命的』勞利之徒會以憤慨的聲音這樣說着。另外還有一些比較謹慎一些的人也許會這樣說：『在最後的分析中，也許牠還是一個工人的國家，可是無產階級專政却已不留一些踪跡了，我們只能看到一個官僚專政之下的，墮落的工人國家』。

對於這個論據，我們無論如何不需要再加以整個的評論，一切對於這個問題該說的話，都在我們這一派的文獻及一切正式的文件中說過了，誰也不會企圖否認，改正或補充布爾塞維克對於這最重要問題的立場。

在此地我們只想以討論下一問題爲限，即究竟官僚的專政是否可以稱爲無產階級的專政。名辭學上的困難，在此地是因爲這一事實而發生的，即專政這一個名辭，現在一方面被應用於有限的政治的意義，而另一方面又被應用於更深刻的社會學上的意義。我們說：『

莫索里尼的專政』，同時又宣佈法西斯主義只是財政資本的工具。究竟那一種說法正確呢？兩者都是正確的，不過是在不同的兩方面罷了。整個行政的權力是集中在莫索里尼的手中，那是無可爭論的事實；但國家活動的整個實際內容，係受財政資本的利益所指使，也同樣是確實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統治（牠的專政）可以找到極端不同的政治形式。從中世紀一直到現在，整個資產階級的歷史，就已證明了這一個法則。

蘇聯的經驗，已足以將同一的社會學的法則——當然得有許多必要的修改——擴大的應用到無產階級的專政上來。從奪取政權起，一直到工人國家消解于社會主義的社會為止，在這中間無產階級統治的方法與形式，依照着內外階級鬥爭的過程而能發生極大的變化。

譬如目前史大林的統治就與革命初年的蘇維埃的統治完全不同，兩種制度的交替，並不是一舉而就，而是要經過許多的方法，應用許多官僚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小規模的國內戰爭。在最後的歷史分析中，蘇維埃的民主主義，已經被社會矛盾的壓迫所摧毀了，官僚制度利用着社會矛盾，把政權從羣衆的組織中奪取過來。在這一意義中，我們可以說官僚的專政，甚之我們可以說史大林個人的專政；但是這種篡奪之成爲可能，且能維持牠自己的存在，祇因爲官僚專政的社會內容，是由於無產階級革命所創造出來的生產關係來決定的，在這一意義中，我們能有充分的權力說，官僚專政乃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一種變形的而又無可致疑的表現。

歷史類比須加以改正

在俄國的與國際的反對派的內部爭論中，對於特米多這一個名辭，我們條有件的了解爲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第一個階段，其目的在反對工人國家的社會基礎（註：孟塞維克也談到特米多的墮落，可是人們簡直不能了解他們的意義何在，孟塞維克過去是反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甚至在現在據他們的意見，蘇維埃國家也不是無產階級的——究竟是什麼，始終是一個秘密。在過去他們要求回復到資本主義，現在他們要求回復到『民主主義』，假使他們不是特米多傾向的代表，那末特米多到底是什麼意義？很明顯的牠只是一個流行的時髦名辭罷了）。雖然在過去我們已經見到爭論的本質沒有因此而受到妨害，但是這個條件性愈來愈不適于分析蘇維埃國家最粹帶有條件性的，不具有現實主義的性質。而且這個條件性愈來愈不適于分析蘇維埃國家最近的進化了，只叫提到這一個事實，就足以證明牠的不相宜，即我們自己時常說到——以很大的理由——史大林的粗野的或巴拿帕特式的政制，但是在法國巴拿帕特主義出現于特米多之後，假使我們仍舊囿于歷史類比的範圍以內，那麼我們就得問這樣的一個問題，既然蘇維埃的特米多還未來，則巴拿帕特主義又何從發生？我們過去的估計在本質上不需要任何改變——沒有任何理由這樣做——但是我們必須將歷史的類比根本加以改變，然後牠能使我們更親切的觀察某些過去的事實，且能更明白的了解某些新的現象。

特米多月九號的政變，並不能消滅資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勝利品，但牠却曾將政權轉入於較爲溫和與保守的耶可賓黨人，即資產階級社會中富裕份子，現在我們不能看過蘇維埃革命中的也是一個向後的轉變，這政變已經在很久以前就完成了，牠完全與特米多相似，雖然在速度上較爲緩慢，在形式上較爲隱晦。蘇維埃官僚反對左翼的陰謀，在初期之所以能保持比

較不流血的性質，只因爲那陰謀的本身比特米多九號那種倉卒的事變進行得更加有系統而完備罷了。

在社會的意義上說，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來得單純，但牠的内部也包含了很多的階層，這在取得政權以後尤爲明顯，當官僚制度與工人貴族聯系起來的時候，牠就開始定形，左派反對派之被消滅，在其最直接的意義上，即表明了政權之從革命先鋒隊之手中，轉入於官僚更保守的份子，與工人階級上層份子之手，一九二四那一年，即爲蘇維埃特米多之開始。

當然，問題並不是說，那兩個歷史事件完全是一樣的，而只是一種歷史的類比，牠因社會構造及時代的不同，而當有其限度，但這一個類比却既非膚淺，又非偶然的；牠是被那革命與反革命時期所盛行的緊張的階級鬥爭所決定的。在兩個情形中，官僚制度都在平民民主主義的背脊上站起身來，而這個民主主義，曾保證了新制度的勝利，耶可賓黨的俱樂部是逐漸的被絞殺的，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家們死於戰場之上，他們成爲外交家與將軍，他們在反動的打擊之下倒了下來……或被逼而走入秘密的狀態中去，然後別的耶可賓黨却飛黃騰達了，他們轉變爲拿破崙手下的總督，他們的隊伍中，不斷的增加着過去政黨中的倒戈者，舊日的貴族，以及庸俗的升官發財主義者。而在俄羅斯呢？在更大的範圍內，以及在更成熟的背景中，大約在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年之後，覆襲了這一幅墮落的同樣的圖畫：蘇維埃與黨的俱樂部逐漸轉變成在書記們指揮下的一些迫害人的機關，而同時這些書記們又完全依靠在一個『最可愛戴的領袖』身上。

在法國，特米多巴拿帕特的制度，穩定了一個很長的時期，這只因爲從封建的桎梏中解

放出來的生產力得到了發展，走運的人，劫掠者，官僚們的觀感與同盟者都變成了大富翁，劫滅了的群眾，則陷於絕望的地位。

國有化生產力的巨浪，開始興起於一九二三年，這對於蘇維埃官僚的本身，是出乎意外的，但他却爲官僚制度的穩定創造了經濟上必須的先決條件，經濟生活的建立，使那積極的與能幹的組織者行政家與技術家的精力，得到了一個發洩的地方，他們物質的與精神的地位，很快的得以改進，因此就創造了一個廣大的特權階層，他們與站在統治地位的上層份子有着密切的聯繫；勞動大眾却只能在希望中過着生活，或者竟陷於無所動心的境地了。

假使有人企圖把俄國革命中的各個階段，統統要在十八世紀在法國所發生的事件中找到類比，那簡直是一些糊塗的書獃子。但是對於目前的蘇維埃政治制度和第一次執政部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和那執政部末期行將建立帝國時的情形，總不能不看到那些類似之點。

史大林雖然缺少勝利的榮光，但是無論如何在有組織的謔上驕下的制度中，他總能超過拿破崙第一的地位。這樣的權力只有絞殺了黨，蘇維埃，與整個的工人階級之後才能達到，史大林所倚靠的官僚制度，物質上完全與那完成了的民族革命的結果相聯系，但他與發展着的國際革命並沒有關聯。就目前蘇維埃官僚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利益及其心理說來，他們與革命的布爾塞維克完全不同，這也正是拿破崙的將軍們與總督們，和革命的耶可賓黨人完全不同一樣。

特米多派與巴拿帕特主義者

蘇聯駐倫敦的大使馬夷斯基最近向英國職工會的代表團解說史大林之審判「反革命的」齋諾維埃夫派是如何的必要和合法，這一個令人吃驚的插話——一千個中之一——突然使我們觸着了問題的中心，我們知道齋諾維埃夫派是那一類人，雖然他們有許多的錯誤與動搖，但是有一點是確定了的：他們總是「革命職業家」這一類人之代表，世界工人運動的問題已經深入於他們的血液，可是馬夷斯基是誰呢，一位右派的孟塞維克，他在一九一八年脫離了他自己的黨跑到右邊去，爲了他可以利用機會，加入全烏拉爾區的白黨政府去做總長，這政府是在柯爾却克的保護之下的，只當柯爾却克被消滅之後，馬夷斯基才認爲走向到蘇維埃的時候已經成熟了。列寧——我和他一樣——對於這一類人具有極大的不信，當然更談不到什麼鄙視了。現在馬夷斯基置身於大使之列，控告「齋諾維埃夫派」與「托洛斯基派」，在努力挑起武力干涉蘇聯以便恢復資本主義——但是就是爲要保護這個資本主義，馬夷斯基曾經用了國內戰爭的方法來反對我們的啊！

現任駐美蘇聯大使脫洛陽諾夫斯基年青時就加入了布爾塞維克，不久之後他脫離了黨，大戰時他是愛國主義者，一九一七年他是孟塞維克，十月革命時他是孟塞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這還不算，在以後的幾年中，脫洛陽諾夫斯基秘密進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只當左派反對派被毀滅以後，他才加入史大林黨，更正確些說，他加入了外交界。

做巴黎大使的波貝金，在十月革命中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歷史教授，革命以後，他才加入布爾塞維克，前任駐柏林的大使肯屈克，以孟塞維克的資格在十月革命暴動的時候，參加了反革命的「拯救祖國與革命的莫斯科委員會」，同時還有個格林科——右派社會革命黨員——

也爲該委員會的委員，可是現在都做了蘇維埃政府的財政人民委員。繼肯屈克而爲相林大使的蘇利支以前是蘇維埃首任主席，孟塞維克怯采的政治秘書，他也在勝利以後才參加布爾塞維克，差不多其他所有的外交家都屬於這一類人。同時委派到外國去的人，特別是有倍克道夫斯基，第米脫利也夫斯基，阿加倍可夫等人——這些史大林派出去的外交家都是表同情於反對派的——譯者——的經驗之後，）都是最可靠的親信。

不久以前，在全世界的刊物上都登載着關於蘇維埃金礦工業偉大成功的電報，其中講到了牠的組織者——工程師克連勃洛夫斯基，巴黎時報的莫斯科訪員，他現在是上層官僚正式的舌人，足以與丟朗締與努易非雪爾相競爭的。在這電報中他很賣力的特別提到克連勃洛夫斯基是一個一九〇三年入黨的布爾塞維克，是『老衛士』中之一員，克連勃洛夫斯基的黨證上確乎是這樣寫着，其實他以青年學生及孟塞維克的資格參加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此後他轉到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去過了好幾年，二月革命起來，我們發見他身爲兩個兵工廠的政府督察員，又是貿易部的委員，並且是反對五金工人職工會的鬥爭中一個積極的參加者，在一九一七年的五月克連勃洛夫斯基宣布列寧是德國的偵探！在布爾塞維克勝利之後，克連勃洛夫斯基隨同着其他的專門家，是我自己將他們吸引到技術工作中來的，列寧完全不信任他，我本人對他也沒有一點信仰，但是今天克連勃洛夫斯基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中央委員會理論機關報布爾塞維克上登載了一篇克連勃洛夫斯基的文章，題目是『蘇聯的金礦工業』，我們翻開牠的第一頁來看：『……在黨與工人階級的可愛的首領史大林同志之領導下，……』三行以下：『……在史大林同志和美國新

聞記者去朗締先生的談話中……』五行以下：『……史大林同志簡單明確的回答……』在這
一頁的收後一行：『……這就是說要以史大林的方法來爲黃金而鬥爭』。第二頁：『……如像
我們偉大的首領史大林同志所教導我們的……』四行以後：『……史大林同志回答他們（布爾
塞維克們）的報告寫道：慶祝你們的成功……』在同一頁上再下去：『……被史大林同志的領
導所感動……』下面一行：『……史大林同志領導着的黨……』兩行以下：『……我們黨與（自）
史大林同志的領導』。現在讓我們來看這一篇文章的結論吧，在那一頁的半中間，我們可以
讀到：『……黨與工人階級的真正的領袖史大林同志的領導』，三行以下：『我們親愛的首領
史大林同志的話……』。

在這樣一條諂媚的巨流之前，諷刺的本身將爲之失色！你應該知道：就是要表示愛，也
決計用不着在每一頁上，提到五次「親愛的領袖」，何況這篇文章，又不是替領袖做生日，而
是關於……金礦呢！在另一方面，此文作者既有這種諂媚的本領，顯然在他的身上不能有
一點革命家的氣味，可是具有這樣才能的人，正是那前任大工廠中的沙皇監督，資產階級與
愛國主義者，他曾經進行反對工人的鬥爭，而現在却是蘇維埃政制的樁石，是中央委員，又
是百分之百的史大林主義者！

另一例子，日前真理報主幹之一，查斯拉夫斯基在本年一月中說：『我們不能出版托洛
斯基，齊諾維埃夫與加米涅夫的反革命的著作，也正如我們不能出版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反動
小說一樣』，這位查斯拉夫斯基是誰啊？在很久以前，他是一個右派的猶太同盟中的孟塞維
克，後來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在一九一七年，他進行了一次最可恥的煽動，反對列

寧與托洛斯基，說他們是德國的代理人，在列寧關於一九一七年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句結束語：『查斯洛夫斯基以及其他像他的那些痞子們』，查斯洛夫斯基這個大名是以資產階級權利自圖的造謠中傷者中最澈底者的資格進入於布爾塞維克黨的文獻中的。在內戰期間，他隱藏在基也夫，他是白衛軍刊物上的一個記者，他之投降於蘇維埃政權，還是一九二三年中的事。現在他却來保護史大林主義，以反對托洛斯基，齊諾維埃夫，與加米涅夫這些『反革命』者。無論在蘇聯的內外，史大林的新聞機關中充滿了這樣的人。

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老幹部已經被毀滅了，革命家多被一些軟脊骨的職業家所代替了，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已經被恐怖，諂媚與陰謀所驅逐，列寧時代的政治局，已經只賸了史大林一人，政治局中的兩個委員已經在政治上破了產，屈服於塵埃之中（賴柯夫與湯姆斯基），兩個委員在監獄裏（齊諾維埃夫與加米涅夫）另一個則被放逐國外，取消了他的公民權（托洛斯基）。講到列寧，恰如克魯潑斯卡耶所說，僅以死而免除了官僚制度的壓迫：不肯鬥徒們找不到機會將他放在監裏，因而把他闢在陵墓中。統治階層整個的維繫已經墮落，耶可賓黨人已被特米多派與巴拿帕特主義者所逐出，布爾塞維克已為史大林主義黨所代替了。史大林這一個人物，對於那由大大小小的馬斯基們，先連勃洛夫斯基們，與查斯洛夫斯基們這些保守的與無情的份子所組成的廣大的階層，却是一個最高的仲裁者，與一切恩惠的泉源，是他們唯一的保護者，替他們擋住一切的攻擊。為要報答這種恩惠，官僚制度就時時高抬史大林，使他成為全國無上的權威，無論黨的或蘇維埃的大會都依照着這一個唯一的標準而組織起來的，即贊成或反對史大林，只有那些『反革命』者才會反對，『反革命』者就治以應得之罪。

這樣就是目前統治機構，這就是巴拿帕特式的機構。我們在政治的字典中，還不能替他找到其他的定義。

資產階級國家與工人國家的不同作用

沒有歷史的類比，我們便不能從歷史上學習到什麼東西，但是類比必須是具體的，在找出了相同的特點之後，我們一定不可以忽略了相異的特點，兩種革命都取消了封建主義與農奴制度，但是其中之一，雖然那極端的一派，也不能超出於資產階級社會的限度，而另一個革命，却真實的推倒了資產階級，並創造了工人國家，這一個基本的階級性的不同，就能使這個類比加以必須的物質的限制。這對於事變的預測上具有決定的意義。

在深刻的民主革命之後，農民從農奴制度中解放出來，而且得到了土地，封建的反革命一般說來，是不可能的了。被推翻的君主，也許可以重建起他的政權並且可以收羅一些中世紀的幻影在他的周圍，但是他總沒有力量重建起封建主義的經濟，資產階級的關係一解脫了封建主義的桎梏，就會自動的發展起來，他們不能為任何外力所阻止，他們預先創造了自己的掘墓人，一定得由自己去開掘他自己的墳墓。

至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則正相反，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僅將生產力從私產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並且將牠交給了由自己所創造的國家使牠直接支配。資產階級的國家在革命後的作用只限於警察的任務，牠讓市場受其自身法則之支配，而工人的國家却必須起着經濟家與組織者的直接作用。兩種政治制度之交替，對於市場經濟只能發生一種間接的與表面的影響，反之

工人政府倘被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政府所代替，則將必然要消滅計劃經濟的萌芽，併從而恢復私有財產的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牠不是自動的而是有意識的建立起來的。向着社會主義的前進，決不能與那企求社會主義或不得不企求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分開，社會主義只能在最高發展的階段上才能得到不可變易的性質，即當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已經遠出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當人們的慾求完全可以得到滿足，而國家也已完全消滅融解於社會的時候，但是這一切還在遙遠的將來，在目前這一個發展的階段上，社會主義的建設是與工人國家的存亡同其命運，只當你將資產階級的『無政府的』與社會主義的『計劃的』經濟之形成的法則，深切的思索了以後，才能懂得我們和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類比有許多不能超越的限度。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完成了民主主義的革命，並開創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力量，都不能把俄羅斯的土地民主革命倒轉過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與耶可賓的革命完全相似，但是集體農場的改革卻仍有其倒轉回去的全部力量，因此生產工具之國有化，也仍有其倒轉過去之危險。政治上的反革命，即令回復了羅曼諾夫皇朝的政權，也不能將封建的土地所有權重新建立，但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消滅，只要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聯盟恢復了政權即可實現。

官僚中派主義過渡發展即成爲巴拿帕特主義

兩種革命之間的基本不同點，以及與之『相應』的兩種反革命之間的基本不同點，當我們

去了解那構成史大林制度之實質的反動的政治變革時，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農民的革命，以及依靠這一勢力的資產階級，極能與拿破崙的制度和調和，甚之在路易十八的治下，也能保持牠自己的勢力。可是在目前史大林治下的無產階級，却已暴露出牠那致命的危險，假使再來一個向右的變革，牠就不能支持了。

蘇維埃官僚——在傳統上雖說是『布爾塞維克主義者』，但實際上久已丟棄了這個傳統，牠在成分上與精神上都是小資產階級的！的產生，就爲要調整無產階級與農民間，工人國家與世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種調整作用，正是官僚中派主義，其曲折的進化，其權力，其弱點，及其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運動之致命的影響的社會基礎。（註：勃朗特來爾派，連那始終不失爲塔爾海馬之學生的社會主義工黨的首領們在內，在共產國際的政策中，只能看到牠的『極左主義』，而否認（現在還繼續否認）官僚中派主義的意義。當日前的『第四時期』，史大林用了共產國際這只釣子，將西歐工人運動拉向正式改良主義的右翼之時，塔爾海馬——華爾雪及其同黨的政治哲學，是表現得何等淺薄與機會主義，這些人們除了死板地記住自己的結論之外，再也不能思索一個問題了。正因爲這個理由，他們對於那說實話這一個原則，即每一個科學分析與每一個革命政策之最高原則，表示出很大的反感）。官僚制度愈能獨立地存在，權力愈加集中於某一個人之手，則官僚的中派主義將愈加轉變或巴拿帕特主義。

巴拿帕特主義這一概念的含義太廣，還須加以具體化。最近幾年來，我們曾經應用於那些資本主義的政府，他們利用無產階級與法西斯的這兩個營壘間的衝突，直接依靠着軍事警察的機關，以『國家統一』的救主的資格，高踞于國會與民主主義之上，我們常常嚴格的將這

一個資本主義衰落時代的巴拿帕特主義，與那年青來的前進的巴拿帕特主義分開，因為後者不僅是資產階級革命之政治原則的掘墓人，而又是他那社會勝利的保護者，對於這兩種現象，我們採用一個共通的名字，只因爲牠們具有共同的特徵，青年人雖然受着時間之無情的摧殘，但是人所常能在他們的身上辨認出他們的年青時代來。

當然我們是把資產階級上升時代的，而不是衰敗時代的巴拿帕特主義，拿來與目前克里姆林宮中的巴拿帕特主義相對比，我們所注目的，是執政部與第一帝國，而不是拿破崙第三，更不是休萊雪和杜美格。爲要做這一個歷史的類比，我們用不着在史大林身上找出拿破崙第三的特點；只要社會的環境有這樣的需要，這巴拿帕特主義就能在各種不同性格的人的週圍，鞏固他自己的勢力。

從我們的觀點看來，這兩種巴拿帕特主義，以及兩者的來源——耶可賓黨與蘇維埃——在社會基礎上的不同，比之個人的特性更其有重要的意義。在前一情形中，問題是在於取消資產階級革命的原則及此政治制度，以鞏固資產階級革命，後一情形中的問題，乃在於消滅工農革命的國際主義的政綱，消滅領導的黨以及蘇維埃，藉以鞏固工農革命。拿破崙發揮着特米多的政策，他所進行向鬥爭，不僅反對封建的世界，而且反對中小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他這樣的將革命所創造的那種制度的成果，完全集中在新興資產階級貴族的手中。史大林保護十月革命的勝利品，不僅反對封建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且反對勞動者的要求，反那他們的急燥與不滿，他摧毀了左派，因爲後者表示着非特權勞工羣衆之歷史必然的與進步的傾向。他在工資，特權，階層等方面極力加以分化，因此創造了一個新興貴族，依靠着新社會

貴族的上層以反對最下層，有時則依靠着最下層以反對最上層，在這樣的鬥爭中，史大林能將政權完全集中於自己之手，然則我們假使不稱他爲蘇維埃巴拿帕特主義，又將稱他什麼？

巴拿帕特主義在其本質上不能持久，平衡在金字塔頂點的東西，倘然不從這一邊滾下來，定從那一邊滾下來，但是如前所述，我們這一個歷史的類比，正在這一點上，遇到了牠的限度，拿破崙之倒台，當然也牽動了一點階級間的關係，但由其本質上說，法蘭西的社會金字塔，仍保持其資產階級的性質，而史大林巴拿帕特主義之必然的倒台，將立刻引起蘇聯的性質問題，究竟牠是否成爲工人國家，沒有社會主義的政權，便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故蘇聯的命運是否將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要看繼史大林巴拿帕特主義而起的是一個什麼政治的制度。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假使牠再能把城鄉大群動員在自己的週圍，才能復興蘇維埃制度。

結 論

從我們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許多結論，茲簡單的敘述於下：

一、俄國大革命中的特米多，並不在我們的前面，而已在很遠的後面了，特米多派現在差不多已經可以慶祝牠們勝利的十週年紀念。

二、蘇聯目前的政治制度，是『蘇維埃』的（或反蘇維埃的）巴拿帕特的制度。其形式若與三人執政部相比，則更近於第一帝國。

三、在牠的社會基礎以及經濟的傾向上，蘇聯仍舊是一個工人的國家。

四、巴拿帕特主義的政治制度，與社會主義發展的要求，這兩者間的矛盾，即為內部危機之最重要的來源，且直接危及於工人國家蘇聯的存在。

五、因生產力仍屬低下，又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故蘇聯內部的階級矛盾，雖然時緊時弛，仍將繼續有一難以確定的長時期之存在。無論如何，在世界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沒有完全勝利之前，牠們總將繼續的存在。

六、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在將來也仍舊是蘇聯經濟與文化發展之必要條件，因此，專政向巴拿帕特主義之墮落，係對於無產階級一切勝利品之直接的與急迫的威脅。

七、青年共產主義者隊伍中的恐怖主義傾向，是一些最惡毒的象徵之一，牠豫徵着巴拿帕特主義在政治上已經走到絕路，牠已經進入於用最殘酷的鬥爭，而為其存在掙扎的時期了。

八、只當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覺的除去了巴拿帕特主義，才能在史大林政治制度必然倒台以後，建立起蘇維埃的民主主義，倘在一切別的情形中，繼史大林主義而起的，只能是法西斯資本主義的反革命。

九、個人恐怖主義的策略，不管牠在何種旗幟之下進行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能替無產階級最兇惡的敵人服務。

十、對於青年共產主義者隊伍中的恐怖主義的萌芽，黨的掘墓人——史大林——應負其道德上與政治上的責任。

十一、使蘇聯無產階級先鋒隊，減弱了力量，不能進行反巴拿帕特主義的鬥爭，其主要的原因，在於世界無產階級之不斷的失敗。

十二、世界無產階級失敗的主要原因，乃是共產國際（史大林巴拿帕特主義盲目的僕人，同時又是改良主義官僚之最好的同盟者與保護人）之罪惡的政策。

十三、在國際範圍內欲求得勝利，其首要的條件，即在於將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隊從蘇維埃巴拿帕特主義之腐化影響，也就是從那所謂共產國際的貪婪的官僚制度中解放出來。

十四、拯救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鬥爭，與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完全相合。

後記：我們的反對者——他們在歡迎着——將抓住我們的『自我批評』。哈！他們會這樣叫喊，你們對於特米多的根本立場都改變了，以前你們只說到特米多的危險，現在你們却突然宣佈特米多已落在後面。史大林主義者多半會那樣說的，他們還會故意的加添一點，說我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爲的更容易挑起軍事的干涉。至於勃浪特萊兒與洛夫斯冬派（美國的右派——譯註）以及另一方面某些極左派的自作聰明者，都會唱着同樣的調子，這些人從來不能指示給我們，究竟我們在特米多這個類比中錯在何處，但當我們現在自己指出了自己錯誤的時候，他們呼喊的聲音却比誰都高。

在上面我們已經指示出，我們對於蘇聯般估計中那種錯誤的情形，問題決不是改變我們在許多正式文件中所規定的我們原則的立場，而只是使牠更爲明確。我們的自我批評，並沒有擴大到對於蘇聯級性的分析，也不曾及於牠墮落的原因及其條件，而只是將法國大革命中的一些著名的階段，以之對比，使這些過程在歷史上更爲明顯罷了。改正了一個部份的，甚至是一個重要的錯誤，對於布爾塞維克——列寧派的基本立場，不僅沒有動搖，並反而使我們因更正確與更現實的類比，而使牠更明確與更具體的站立起

來了。我們還得附加說明的，最近因為政治墮落的過程（這正是我們所討論的）愈加明顯，所以更使我們容易發見自己的錯誤。

我們這一派別，從來不要求一成不變的規律，我們決不像史大林主義的那些大主教們一樣，只想接受像天啓一般的現成真理，我們學習，我們討論，我們在生活的光輝中檢察我們的結論，我們公開的改正我們承認的錯誤，並且——我們向前邁進。科學的良心與人格的嚴肅，乃是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之最可貴的傳統，我們就是在這一方面也仍舊忠實於我們的導師。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

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

孔 甲

人們對於民主主義，自來有不少的誤解。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做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人類社會，自有政治的組織及其消滅，在此過程中，民主主義乃隨着歷史的發展，而形
成各階段的內容與形態。

在未分階級未有國家的氏族社會，即已有政治組織，從莫爾干所謂一權政府（酋長會議）至三權政府（酋長會議，人民會議，及軍事總指揮），都是民主主義的，即如莫爾干所說：『會議，在全員周知的事件之下而召集，在民衆環視公開演說之中開會，牠在民衆影響之下而行動，那是一定無疑的。形式上雖屬寡頭政治，實是民主主義的代議制。代表們雖以終身職而選出，然須服從於罷免。在各氏族員之同胞關係上及關於公職之選舉制度，乃是民主主義之萌芽與基礎。民主主義，亦如其他大原則一樣，在進步之初期階段，即有此不完全的發達，人類是可以老世家自家的。』（古代社會第二篇第四章一一八頁）

到了階級的社會，民主政制，受了土地貴族大的摧毀；直至第三階層即市民各階層出現，才舉起民主主義（Democracy）旗幟，來和貴族政治（Aristocracy）對抗。這一長期的市民運動之目標，綜合起來，即是推翻壓制平民之貴族、國王、教主、少數人的特權，在政治上經濟上擴大普遍的民權，具體說來，即是以民選議會代替國王及貴族之專制，解放行會，解放

農奴，這便是民主革命的任務之主要內容（有人以為民主任務只限於經濟的，這是不合乎歷史事實的胡說。）在社會主義運動未發生以前，完成這些民主任務，乃人類進步之唯一的偉大指標。所以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

近世各國的革命運動，都或多或少的向着這指標進行。參加革命的各階級及其各階層，都在這指標之下，爲自己的利益而行動，並非將民主要求看做是資產階級的任務，預先爲造成資產階級的權力而行動，即資產階級本身，亦非自始就有這種企圖，相反的，牠在其初好幾個時期，尙企圖和舊統治階級妥協，在舊統治階級權力之下，獲得若干利益，以共同抑制下層人民；牠並且不完全贊成這些民主任務的要求，特別是真正普選和徹底解放農民，資產階級所最後保留的，只是一種形式的民主主義，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一句謊話，和豬圈的議會，在法西斯特的今天，連這個都不要了。但鬥爭的結果，只因為當時沒有強大起來能夠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一切權力都自然的落到資產階級的手中。因此，歷史家不得不承認這一時期是資產階級的歷史時期，也就認爲這一時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並認爲革命中所需要完成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任務。我以爲嚴格說起來，應該是人類社會進步過程中的歷史任務。在理論上，完成這些歷史任務的，並不限定是那一階級；在事實上，也只有英國或者可以說是資產階級領導農民完成的，在法國是小資產階級領導工人完成的，在俄國乃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完成的。

落後的俄國之無產階級，在完成民主任務鬥爭的基礎上，比諸先進國之無產階級早些獲得了政權，這便是「不斷革命」的戰略得着了第一次實驗之成功，把「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幹社

會『革命』這一舊的傳統思想，打得粉碎。這一戰勝，在中國革命中也得着了一種反證，即是：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若不能取得政權，革命只有失敗，完成民主任務的話便無從談起。資產階級愈到東方愈無能愈無恥，孫中山的黨——中國資產階級最先進分子的黨，從開始發生第一秒鐘，一直到今天，無論在理論上在行爲上都是反民主主義的。他們的所謂革命，只是簡單的等於北伐成功取得政權，至於完成民主任務如排除帝國主義勢力使中國獨立，解放農民，民選議會，等等，都算是『赤化』，都和他們如冰炭之不相容，連形式的民主主義和豬圈的議會都沒有。（在這裏，我們還要注意：鮑羅庭從莫斯科帶來的東西，除槍炮外，算是反民主主義的議論，最合他們的口味！）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無論在數量上如何龐大，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無論如何重要，也不能居領導地位，所以中國完成民主任務的責任，終於要放在無產階級的肩上，這便是中國革命之不斷性的客觀論據。

所謂『不斷革命』，並非如字面的解釋：以爲是說有利於革命的客觀局勢是不斷的；這是一種不值論駁的謬說。或者以爲是指主觀上不斷的努力進行革命，不停止在民主階段上；這句話本身雖不算錯，然詞意含混，可以解釋成史大林派所攻擊的所謂『半托洛斯基主義』，即是說，『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階段，緊接着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很快的轉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不過是較急進的階段論，而非『不斷革命』的意義。

『不斷革命』之真實意義，是指出落後國家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不可分離性。這就是說：落後國的無產階級能夠在民主革命的基礎上取得政權；由無產階級的政權來完成民主任務。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權，落後國的民主任務便無從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

命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分成兩個階段，完成前者再進行後者。

『不斷革命』之最基本的論點，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發之前，已經堅決的定下了。在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列寧是托洛斯基的學生，托洛斯基不是列寧的學生。

如果有人企圖抽去民主主義的內容，僅僅把牠當做一個抽像的空洞名詞用，他便完全是一個爲資產階級欺騙民衆的策士，甚至汪精衛夾袋中都有時都會需要這種人物。一切真理都是具體的，所以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具體的，所以我們所謂民主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指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排除帝國主義的勢力使中國獨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歸貧農，以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這些具體內容。

如果有人認爲無產階級不應該把完成民主任務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那便有幾方面的錯誤：（一）不懂得民主主義在人類社會進步上的歷史意義；（二）幻想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有多少民主主義的氣味，其實，聰明的中國資產階級，很懂得民主主義運動，對於牠比社會主義更是直接的現實的災難；（三）把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推遲到遠不可知之歲月，因爲中國的資產階級永世不能掃除發展資本主義的障礙，使無產階級有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奪取政權之可能；（四）拋棄了民主的口號與鬥爭，便無法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特別是農民，中國的無產階級若沒有農民的同盟，休想取得政權。如果他以爲他並未曾主張過拋棄民主鬥爭；那末，我便要問：鬥爭而不肯放在肩上，這是什麼把戲？把民主鬥爭放在那一階級的肩上？是否無產階級只應該把社會主義鬥爭放在自己的肩上，民主鬥爭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事，無產階級只好跟在他們後面參加鬥爭？

中國無產階級將在什麼口號之下奪取政權，我們現在不能知道，這不但要依國內局勢，而且要依國際局勢；國民會議運動在中國將經過那些過程，作何結果，現在也不能知道，這要依階級鬥爭來決定，國民會議和蘇維埃一樣，並非一定的模型。惟如果有人企圖把我們現時採用的國民會議口號，預先和解決民主任務及奪取政權分開，這完全是自由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觀點，這明明是預先準備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國民會議政府之下，在不能解決國家獨立及土地等問題的國民會議之中，做一個反對派。

對民主鬥爭和民主鬥爭中之總的口號「國民會議」加以非革命的解釋，這都是門什維克的傳統思想，此種思想雖只在萌芽，我們即應嚴加駁斥，何況現在已經系統的堅持着他們的成見！

這些思想之錯誤，根本都由於不認識「不斷革命」的戰略之重要性與可能性。

或者又有人說：我們爲了爭取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來推翻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才採用民主主義的政綱與口號，這不過是一種手段，取得政權後使用不着牠了。我答曰：否！否！我們取得政權之後，正是我們的民主政綱實現時代之開始，而不是牠的終結，只可以說在那時我們不能以民主政綱自限，而不能說用不着牠。我們採用民主主義的政綱與口號，是目的，並不是手段。民主主義是對於官僚主義的抗毒素，牠和社會主義並不是對立而不相容的東西，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並不是拋棄民主主義，而是擴大民主主義，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即是從資產階級的狹小範圍，擴大到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民衆，從量改變到質，從議會到蘇維埃，並且還要從大多數人民政治繼

續擴大到全體人民政治，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是要採取迅速的手段，來徹底的剷除官僚主義，而且能夠把這種手段應用到底，直到官僚主義完全消滅為止，直到代表民衆的民主主義完全實現（按此即列寧所說的『真正全體人民都來參與國家行政』為止。』在這一意義上，在現時代，只有無產階級才是民主主義勢力的真正代表，我們共產主義者同時也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

史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才至把黨，把各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踏得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惡，使列寧發於無語可以駁殺考茨基，真要氣死列寧的幽靈！

平心而論，蔑視民主主義的人，並不只是史大林，有許多淺薄的老布爾什維克黨人，因為形式邏輯頭腦的考茨基一班先生們，拿民主主義來對抗無產階級獨裁，他們也就拿無產階級獨裁來和民主主義對抗，兩方面都以為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是不能並存的，同樣是形式邏輯的頭腦，這便是史大林派的官僚主義無限制發展的大助力之一。

生長在官僚主義的祖國而沒有馬克斯主義素養的我們這一輩的中國青年，在莫斯科接受到這樣的空氣，自然認為民主主義是和資產階級不可分離的，和資產階級同樣的醜惡，要同樣拋棄在垃圾堆裏，清潔的無產階級，清潔的共產黨人，應該和民主主義永遠絕緣，沾着牠總有點臭氣，於是乎『民主主義者』便成了一個罵人的名詞。在一九二四——二五年頃，有一以國際代表和幾位由莫斯科回來的中國同志，都先後告訴我：提倡民主主義是托洛斯基的錯以之一。

我們現在應該矯正了罷！

矯正的要點是：（一）不要把資產階級狹小的形式的民主主義，當做是歷史上隨着各

階級發展的民主主義之全內容！

（二）不要把民主主義當做是和社會主義不能并存的東西！

（三）不要把民主主義的要求當做僅僅是推翻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的手段而不是我們的目的！